

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

——鲁迅文论研究之三

教 忠

(重庆教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67)

摘要:鲁迅作于1927年7月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讲演,既是一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论,也是一篇讨伐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深刻剖析,其中对晋末诗人陶渊明的评论尤其学术独创性。全篇讲演运用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至今仍不失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典范。

关键词:鲁迅;魏晋文学;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2)03-0038-05

Aesthetic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AO Zho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Chong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speech of *Wei and Jin Dynasty Styl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cle and the Medicine and Alcohol*, which was given by Luxun in July, 1927, was an important article studied Wei and Jin Dynasty literature, and also an war proclamation sent armed forces to autocracy. Its main value was analyzing Wei and Jin Dynasty literary style and its formative causes. Among them, the essay on poet Tao Yuanming owned the academic originality. The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applied on analyzing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is still today's model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Luxun; Wei and Jin Dynasty literature; aesthetic criticism; historical criticism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是鲁迅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7日《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178期;改定稿刊于是年11月16日出版的《北新》半月刊第2集第2号;后收入《而已集》。

1927年7月,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鲁迅应邀赴会讲演。讲演的时间为7月23、26两日(改定稿副题记作“九月”,实误)。《鲁迅日记》1927年7月23日记:“上午蒋径三、陈次二来邀至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同月26日记:“上午在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显然课题足分两次讲完的。

鲁迅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半年后又离开厦门,于次年1月至广州,2月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4月因营救无辜被捕学生无效而辞职;

9月离穗去沪,10月初抵上海。

鲁迅在穗期间,是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沪、宁克复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15两日相继在上海、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镇压工人武装,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中国政治陷入空前的黑暗之中。“4·15”政变中,中山大学毕磊、欧阳继统、熊锐等40余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被捕。当天下午,鲁迅即以教务长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之策。校长朱家骅公然宣布中山大学从此为国民党“党校”,阻止营救。鲁迅拍案而起,愤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许寿裳、许广平亦相继辞职,决心“与鲁迅共进退”。从此,鲁迅认识到旧中国政、教两界一样黑暗,决心离开教席,专事著述,以笔作枪,同各种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

关于1927年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与鲁迅应邀出席讲演一事,鲁迅在两封致友人书信中曾经谈

收稿日期:2001-09-10

作者简介:教忠(1937-),男,湖南桃源人,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编,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及,很值得注意。1927年7月17日致章廷谦信云:“现在我已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暑期学术讲演……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1]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云:“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2]前信写于讲演之前五日,信中“鼻辈”指顾颉刚、傅斯年等人。顾、傅当时都为中大学校当局所信任,与学校当局保持基本一致的立场。鲁迅断言他们对他的讲演必“不乐闻”,甚至“几夜睡不着”,说明他是有心要借“学术讲演”之机借题发挥,抨击一下时政。后信写于讲演一年多之后,所谓“有慨而言”,也明明是说他谈魏晋时代文人遭受专制统治者的种种迫害,是针对现实、有所影射的。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谈“魏晋”,斥责蒋氏的专制独裁,滥杀无辜,使正直的文人学者根本没有活路。在1927年血雨腥风的广州,鲁迅怎么能平心静气地作那种脱离政治的“纯学术讲演”呢!可以说,《魏晋》是在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文论。我们不妨认为,它既是一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章,同时也是一篇讨伐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当然,它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深刻分析。这种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写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魏晋》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谈魏文,分别论述“三曹”与“七子”;一部分谈晋文,主要论述正始名士包括“竹林七贤”,最后以论陶潜作结。讲演虽分两次,但全文浑然一体,既无断裂,也无重复。述史简明而生动,说理透辟而诙谐,既具学术价值,亦具可读性,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文学批评之作。

魏文有何特点?这种特点是怎样形成的?

魏文代表性作家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与“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玚、刘桢)。他们都是建安(汉献帝年号)至魏初一段时期的文人,文学史上称这一时段的文学作品为“建安文学”。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重要性在于它有着与其所产生的时代相一致的独特风格,是中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评论魏文首先要说到曹操。鲁迅认为曹操诗文特点可用“清峻”、“通脱”来概括,此与曹操“尚刑名”等有关。这一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已经谈到,但未作充分阐释,鲁迅指出,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黄巾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政权;董卓专权,密谋篡位,引起军阀混战;再加上“党锢之祸”造成的社会动荡,百姓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曹操在这种背景下出面收拾残局,重振朝政,不得不用严刑峻法。“尚刑名”就是严明法纪,以法治国。法纪条文自然要避免繁文缛节,这种文风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形成了“清峻”的特点,具体说来,就是“简约严明”的意思。

“通脱”即“融通洒脱”之谓,鲁迅解释为“随便”。东汉末期,上层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过分“清高”的恶习,导致思想僵化、保守,曹操认为不革除此种流弊,思想文化难以发展,故力倡“通脱”。他主张冲破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容纳孔教以外的思想;主张任人唯才,不忠不孝也不要紧。这些主张,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上来。后汉文章多受辞赋骈偶影响,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曹操诗文则喜用简洁朴素的文笔自由抒写,少受骈体文赋束缚。故鲁迅称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给予充分肯定。

建安文学于“清峻”、“通脱”之外,还具有“华丽”、“壮大”两个特点。这两点蔚为风气,主要靠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倡导与实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主张“文以气为主”,认为好的文章要注重藻饰,写得文采斐然,气势磅礴,且不必硬将训勉寓于其中。这实际上接触到文学的审美特性问题,故鲁迅给以很高的评价:

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3]

鲁迅向来不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为什么独对曹丕“不必寓教训于诗赋”的主张持肯定态度呢?这主要就是因为曹丕已经初步意识到文学的审美特性。所谓“不必寓教训于诗赋”也并非反对文学的思想性,而是主张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这从他把文学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张“本同而未异”^[4]等,即可了然。鲁迅历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甚至主张革命文学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也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5]这一见解与曹丕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盖出于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理解。

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些特点,在“三曹”文章中分别有所表现,但综观建安诗文,还有一个更普遍、更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悲凉和慷慨。这一点,鲁迅论及“建安七子”时说到了:

七子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慷慨”,“华丽”吧。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这段评述“七子”的文字,毋宁说也是对整个建安文学的总体概括。它不仅说出了整个建安文学的基本特色,而且深刻地揭示出造成这种特色的社会原因。汉魏之际,战乱频繁,田园荒芜,生灵涂炭。社会本身充满悲凉、慷慨的氛围,文学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曹操《却东西门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城郭为山林,庭野生荆艾”(蔡琰《悲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这样的描写,在

汉魏之际诗文中俯拾即得。它们或则反映社会动乱与黎民疾苦,或则抒发人生感喟与对国家统一的渴望,无不涂上悲凉、慷慨的色彩,同时又表现出刚健峭拔的风格。文学史家所谓“建安风骨”,大体指此。建安时代既然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各个作家的作品自然有其不同的艺术特点,但从宏观上把握,鲁迅的这种概括,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当的。

“二曹”、“七子”之后,在魏晋之际文坛上较有影响的作家是“正始名士”何宴、王弼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魏晋》论及何宴篇幅较多,但主要说他是空谈与服药的“祖师”,对他的文章甚少涉及。嵇康、阮籍是鲁迅论述的重要对象,也是从他们立身处世的态度(特别是饮酒)谈起的。正始(魏废帝齐王年号)年间,司马父子操纵了曹魏政权,随时准备篡位。他们排斥异己,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依附曹氏父子的人,动辄得咎,不断遭受迫害。他们为避免杀身之祸,不得不逃避政治,或寄情山水,或放浪形骸。服药、饮酒甚至伪装痴癫,正是他们反抗现实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点,一般治魏晋史的学者都看得出来。鲁迅的深刻处在于他认为嵇康、阮籍表面上洒脱、放浪,不拘俗礼,“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意。”在鲁迅看来,嵇、阮等名士倒是真心信奉礼教、真正地关心时政的;因为不满统治当局,不愿与之合作,于是借服药、饮酒等行为来掩盖真相,排遣苦闷。他们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这一特殊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正始名士”(包括“竹林七贤”)都是当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既然反映出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服药、饮酒于是便成为中、上层社会一种带普遍性的风尚。这种由时代所造成的社会风尚、社会心理自然也要反映到文学上来。鲁迅评说阮籍:“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又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这个结论与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嵇康为文富于独创,阮籍做诗注重气势)是相通的。鲁迅通过对时代与社会风尚、社会心理的具体分析所做出的这些结论,可谓言简意赅,水到渠成,话虽不多,但却把时代政治环境、社会风尚、社会心理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三

《魏晋》结尾部分,集中论述了晋末大诗人陶渊明。陶潜诗文的风格特点是“平和”、“淡泊”,此亦与社会时代有关。因为整个东晋社会思想是趋于平静的。究其原因,一为佛教思想的渗透,二因人们对于社会动荡习以为常,即鲁迅所谓“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陶渊明即是在此种文化氛围中养成为一名世所公认的“隐士”、“田园诗人”。鲁迅并不否认这个评断。

但鲁迅在《魏晋》中还指出了陶潜的另一面,即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超然物外”、脱离现实的诗人。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那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重点为引者所加)

鲁迅这里讲了两种“完全超越”:一是所谓“完全超越”政治功利;一是所谓“完全超越”现实生活。他认为两者都是不可能的。这段话讲得极有分寸。正确理解,应该是说艺术对于政治与现实生活,是可超越,又不可超越。说“可超越”,是说艺术不可能处处听命于政治,不可能为某种临时性的政策或策略服务,图解政策条文。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论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只是说无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总体方向上应该保持一致,并非要求文艺为一时一地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又,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并非对生活作机械复制,它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和更理想;特别是在当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文艺更需超越世俗物欲,追求精神的完善。说“不可超越”,是说从根本上讲艺术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的源泉只能是社会生活;而且艺术反映生活不能不表现创作主体的倾向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艺术受客观现实生活和创作主体的双重制约,这就使艺术归根到底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与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废除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但仍然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可超越,又不可超越”的辩证法。鲁迅在“超越之前特别用了“完全”二字,表明了他对艺术规律的充分理解。

鲁迅这段论“超越”的文字,对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是很深刻的批判。历来倡言“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情况较为复杂。有因认识偏颇而真心诚意地致力于艺术的完美而疏离政治或世俗生活者;有因对现实政治不满而以潜心艺术为逃避方式者;更有以此为借口而掩盖其实际倾心于别一种政治的真实面目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以“为艺术而艺术”相标榜,即以为艺术可以超越任何政治的、现实的一切功利,是有悖于科学,亦即有悖于艺术规律的。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有理想、有追求而又特别敏感的人,对于政治斗争、社会事变都是了然于心的。如果他要做一个彻底“超然物外”的人,他为什么还要创作呢?即使像陶潜这样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6],也有《述酒》、《读山海经》、《咏荆轲》这样不能忘情于世事或富有反抗性的诗作!

为了说明世间没有完全超越于现实的文学,鲁迅特别提出陶诗《述酒》一篇,以为“是说当时政治的。”据南宋汤汉注《述酒》云:“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罍使张祚献王,祚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园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酒名篇也。”^[7]这就告诉人们,《述酒》是反映刘裕废恭帝这一“晋宋易代”的重大政治事变的诗作。诗中列举许多古代篡弑方面的典故,可以说明上引汤注的确凿。《述酒》诗题下小注“仪狄造,杜康润

色之”，亦明显隐喻“桓玄篡位于前，刘裕称帝于后”，说明此诗是为晋王朝灭亡而创作的一首哀歌。事实恰如鲁迅所言，被历代文人称为“不染尘俗”、“浑身静穆”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

认为文艺可以超越于现实政治功利，文艺家乃是超然于世间一切生死利害的“超人”，这是20世纪30年代所谓“第三种人”的一种观点。鲁迅对此有过许多形象而深刻的批评。出人意外的是，这种十足的唯心主义文艺观在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崛起于一时，至今犹有一定影响。有人认为，作家只有摆脱一切政治束缚，实现“对‘生死利害’这种现实意识的超越”，才能“复归为全面完整的人”；认为这种“充分的主体性和充分的超越性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刘再复，等。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6) - 1986(1)]。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唯心主义思潮在文艺领域泛滥的典型表现之一。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是根本对立的。具有一般常识的文艺工作者都记得恩格斯的名言：“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8]恩格斯所揭示的是文艺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作家、艺术家既然普遍存在“倾向”性，他怎么能成为唯心论者所心造的那种“超人”呢？

四

一生对文艺保持浓厚兴趣的恩格斯在阅读拉萨尔剧本《济金根》之后，致信拉萨尔，对他的剧本作出了详细分析，并于最后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9]在我看来，恩格斯所遵循的这个“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原则，在当今世界文艺批评模式多元化格局中，仍不失为一种最可靠、最科学的批评方法，它的精义即在于艺术审美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

鲁迅在《魏晋》讲演的开头便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这种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魏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色，首先表现在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阐释。如前所述，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的种种特点，归根到底“是时代使然”。但他在具体评述某一种特点时，又是从历史内容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上作出判断的。例如说到魏文的“慷慨”与“壮大”，鲁迅认为如果没有那一时代的动荡与离乱，就不可能成为那一时代诗文的普遍风格。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魏晋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壮的时代，用纤细的笔触，自然难以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面貌，“慷慨”、“壮大”的特色便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既是对这一时代诗文历史内容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时代诗文学特征的概括。至于说曹操提倡“清峻”“通

脱”，曹丕提倡“华丽好看”等，那显然也是从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所作出的判断。

《魏晋》的唯物史观还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上。文章涉及“三曹”、“七子”等历史人物20余人，重点评述的是曹操父子、孔融、何宴、嵇康、阮籍及陶潜等人。鲁迅评述他们，较多事实叙述，而较少绝对化的判断，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他的结论总是比较灵活，留有余地。例如对“建安七子”，鲁迅就说“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对何宴也说他的为人真相现在“很难知道，很难调查”。这些地方，正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对曹操就不同了，因为曹操留下的诗文及相关史料较多，鲁迅便断然肯定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这样评价曹操，完全排除了《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同样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关于《三国演义》对曹、刘的处理，鲁迅早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有过异议的，认为曹操“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该书写得他“事事全坏”，是“出乎情理之外”^[9]的。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广兴屯田等“政治上的好处”，为进步史学家所公认；单就文学成就而言，他的悲凉、慷慨的诗篇，在反映汉末动乱岁月人民流离失所的苦痛，表达统一国家的进步愿望，以及在继承《诗经》、《楚辞》、汉代乐府优良传统，推动五言诗发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鲁迅对曹操利用权术谋杀异己、实行专制独裁的一面，也有所批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一个诗人兼政治家的真实的曹操。

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割断历史。怎样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魏晋》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鲁迅是一概排斥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鲁迅对传统文化发表过偏激的议论，但在严肃的学术问题面前，他是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的。他十分珍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但又不为传统观念所囿；他重视学术前辈的一些“定论”，但决不盲从“定论”。阅读《魏晋》，我们不难看出，从曹丕《典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到近人著述，凡可采纳的成就，他都一一吸取；对于前人不正确或不完备的论断，则予以辨正或补充。例如前述《文心雕龙·时序》中关于“慷慨”原于“世积乱离”的观点，鲁迅不仅全盘接受，而且进一步作出发挥；又如《文选》李善注中指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萧统《文选》卷23咏怀诗注）鲁迅不但采纳，而且进一步指出阮籍等人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满的，并由此推定“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嵇、阮非薄礼教，实在是出于对当权者借维护礼教之名而诛杀异己的一种反抗。这就比古人的见解深刻得多了。再如对陶潜，《诗品》定下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基调，世代沿袭，鲜有新见，直到清人陈沆作《诗比兴笺》，才指出其“《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悲愤”。鲁迅肯定陶潜“是

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但同时又着重指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启示我们要全面地评价这个作家。他后来还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10]鲁迅对陶潜始终是用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的。

新时期以来,文坛有一种不良风气,就是轻易否定前人,或明明前人有说在先,有的人却视而不见,硬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充当自己的“发现”或“发明”。鲁迅完全不是这样。他同胡适政见相去甚远,但在小说史研究中却充分引用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见解,并给予较高评价。在《魏晋》讲演中,他充分肯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南北朝文》、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以及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认为“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他特别把刘师培的书作为重要参照,并对自己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

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这种充分珍视前人成就,并以此为基础和起点继续开拓的精神,正是学术事业不断发展、持续前进的永恒动力。

参考文献:

- [1]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559;646.
- [3]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 鲁迅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4.
- [4] 曹丕. 典论·论文[A].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8-159.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8.
- [6] 陈延杰. 诗品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1.
- [7] 吴泽顺. 陶渊明集[C]. 长沙:岳麓书社,1996.69.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4.347.
- [9] 鲁迅. 鲁迅全集(第9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3.
- [10]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2.

(上接第21页)无(轻)污染的工业项目;积极发展生态环境型绿色产业。

大力加强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中心城市金融保险、商贸、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房地产和信息咨询等服务化产业发展,加速第三产业的质量扩张,推动城镇现代化建设。

(五) 旅游开发保护措施

为保护风景资源及整个景区的生态环境,可将风景区分级保护。一级保护区(即风景游览区),是风景区的核心部分,应对其范围内的地貌、水体、山石、植被及文物古迹等严加保护。以湖泊为中心,包括景点和联系景点的主游路线的一定范围内为二级保护区,该区域内不准任意破坏林木山石、溪流,严禁开山采石、挖沙、伐木;一切建筑物和工程构筑物要因因地制宜,建筑风格与形式要与风景区基调协调,注意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与风景区相邻的外围保护地带为三级保护区,该区的保护主要是保护整个风景区的环境空间,提倡封山育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以形成风景区外围的绿色保护屏障。

(六) 行政管治措施

长期以来,缺乏湖区流域的统一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湖区流域的山林、水体以及物理环境治理分别属于林业、农业以及环境保护部门切块管理,不利于统一行动,同时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措施。为了加强湖区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应该成立专门的湖区流域管理机构,统一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同时

制定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治制度,将湖区生态环境保护、湖区污染控制与治理纳入统一管理轨道。这是湖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 [1] 王洪道,窦鸿身,顾京松,舒金华,张玉书. 中国湖泊资源[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 [2] 杨文龙. 云南高原湖泊的开发与保护[J]. 湖泊科学,1994,6(2): 161-165
- [3] 邓红兵,王庆礼,蔡庆华. 流域生态学——新学科、新思想、新途径[J]. 应用生态学报,1998,9(4):443-449.
- [4] 阙水玉,王祥荣. 流域生态学与太湖流域防洪、治污及可持续发展[J]. 湖泊科学,2001,13(1):1-7.
- [5] 黄谔,曹滢.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环境状况严峻[EB/OL]. <http://www.unn.com.cn>, 2000-10-18.
- [6] 王祥荣. 生态与环境[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 [7] 杨士弘. 城市生态环境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 [8] 黄耀志,黄光宇. 山地城市生态特点与自然生态规划方法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 [9] 陈永森. 云南省志·地理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0] 荷兰 Delft 水利所,云南省环保局,荷兰 DHV 咨询公司. 抚仙湖综合整治总体规划报告[R]. 昆明:云南省环保局,1999.
- [11]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玉溪地区环科所. 抚仙湖、星云湖流域环境规划研究报告[R]. 昆明: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1996.